

黄皙暎中短篇小说中的韩国产业化之痛

哲学系 20 本 吕欣远 2000014921

摘要：黄皙暎早期中短篇小说深刻地塑造了一批形象鲜明的底层人物，通过抒情而现实的笔法讲述了这些人物悲剧性的命运，揭露出产业化时代广大底层民众的生存现实，充满了对上世纪 60-70 年代韩国产业化时期社会的剖析和反思。本文意在对于作家早期的几篇小说进行综合统摄的分析，集中揭示黄皙暎小说所展现的主题，透过小说里的人物和其经历透视作者的思考和价值传递。本文将大体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是展现黄皙暎小说中的城市化和失乡民的归属缺失，二是分析现代化过程中作家笔下底层民众的边缘化与异化，三是尝试揭示作家对于现实问题的回答和作出的价值坚守。并最后阐明黄皙暎文学作品所要达到的对于“人性”和“生命”的坚守。

关键词：黄皙暎；产业化；底层人民；边缘化

前 言

黄皙暎于 1943 年生于日占的长春，并于 1948 年韩国光复后随父母定居汉城，经历了其少年和青年时光。在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里，黄皙暎先后见证甚至亲身经历了朝鲜战争、4·19 民主革命、5·16 朴正熙军事政变、韩国产业化、越南战争、光州事件等一系列决定韩国现代历史和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并亲身体验过流浪生活，接触过底层民众^①。60-80 年代真切的社会经历和观察使得黄皙暎开始将文学创作的关注点放在社会现实和底层民众上，并于 70 年代陆续发表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作品，包括《去森浦的路》、《身边的人》、《发财猪梦》、《大力士之梦想》、《客地》等。

这些小说的主题相对一致，都是产业化时代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地面对的生存困境和他们苦难的人生经历。小说里的主人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前往城市谋生路，然而却被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异化、边缘化，成为无根的流浪者。这些被剥夺被支配的民众在浑浊黑暗的社会现实里或挣扎，或斗争，或堕落，并往往在其毁灭里展现出其人生和时代的悲剧性。作家以饱满的感情叙说着这些人物的遭遇，揭露着产业化对底层民众生命和尊严的剥夺和消泯。但是与此同时，又在其反面传递出一种最后的希望和坚守，

^① 焦艳：《黄皙暎的传奇经历和文学创作》，外国文学动态，2004 年第 5 期，30-32 页。

也就是自己的文学“永远站在无生命、反人类的对立面”。

从现代性分析来看，黄皙暎小说所展现的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在韩国社会的特定表现。伴随着韩国社会从前现代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城市化·产业化不可避免地带来现代性的通病——生存论危机和商品拜物教，以及赤贫阶级的产生和极度的异化与剥削。但是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带有东方社会独有的特点——短时间高速的发展和社会结构严重的失衡。此外，这个过程也体现着韩国-朝鲜民族特有的民族性，处处透露着一个被支配的民族之分裂之苦和无根性，以及对于自身命运无掌握感的迷茫与悲哀。黄皙暎笔下的人物正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下韩国民族精神状况的写照，他们的苦难和爱恨血泪折射着时代历史的阵痛和一个被分裂被支配民族本身的感伤。

一、归乡与失乡——精神家园之归属的丧失

虽然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应该按照“离乡-归乡-失乡”的顺序来展开，但是“归乡-失乡”却实际上并不先于“离乡”。恰恰相反，产业化过程使得故乡不再存在，使得人们被迫成为外乡人，生存本身使得他们不得不前往城市谋生；而同时现代性本身首先摧毁那个名为“故乡”的精神家园，使得归乡而无处可归的人们经历归属感的丧失，并不得不成为“离乡”人。因此，本文将先来分析失乡与精神家园的丧失。

在上世纪 60-70 年代，朴正熙威权政治下的韩国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下，实现了经济上的飞跃，创造了“汉江奇迹”。而迅速的产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是人地关系的失衡和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失衡，“1960 年，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的占有率为 28%，城市土地面积在全国土地面积的占有率是 2.8%相当于人口比率的 10 倍”^①。而工业化进程不断使得城乡差距拉大，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低粮价和城市产业化的繁荣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巨大的差距使得农民要想摆脱贫困，就不得不离开乡村而加入到产业化的浪潮中；此外，城市化发展不断地将乡村改造为城市，乡村空间让位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城市对乡村空间挤压的两重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前现代生产方式的淘汰，裹挟着社会向前资本主义和大工业发展。

而社会的剧烈变化并没有容得人在思想和技能上准备好这种变化，广大离乡进城的农民实际上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被淘汰于时代的变化。他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被淘汰而边缘化的现实面前只能回过头希冀一个曾经“可生存”的故乡，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不可生存”

^① 《当代韩国史》，曹中屏、张珽瑰等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278 页。

的令人窒息的游荡状态。在《去森浦的路》中，游荡半生的“郑氏”始终希望回到他的故乡“森浦”，而当同伴英达问到他返乡的目的时，他却只能回答“没什么……就是年纪大了，想回去看看”^①，表达了一个离乡的流浪者的疲惫和对于归属的需求。在郑氏的印象里，故乡是一个“美丽的小岛，到处是肥沃的土地，鱼也是想抓多少就抓多少”（《客地》，2010，6），俨然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与郑氏类似，逃离饭店（实则妓院）而与英达和郑氏碰着的少女白桦也有回家的愿望，对于回家以后的生活，她的想法是“就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安定下来干点农活”（《客地》，2010，19）。两个人对于故乡的渴求是一致的——一个能够结束自己流浪生活而提供安定的居所，一个可以赖以生活的家。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归属的需要和归属感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小说关于白桦的假名和真名的二分这个细节上。当谈到家乡的话题时，白桦不经意间提到“我虽叫白桦，可这是我的假名……我的真名，谁也不告诉”（《客地》，2010，15）；而到后来白桦爱上英达并在分离时“含着泪水笑了”最后告诉英达“我不叫白桦。我真名叫……李典礼”（《客地》，2010，22）。可以看出，“白桦”所对应的是少女在外流浪的生活所形成的一个身份，仅仅是一个“妓女”，而从“我不叫白桦”里也可以想到少女对于这个异己的身份和这种异己生活的不承认。相反，“李典礼”才是少女的真正自我认同和归属，当她信任英达并将真名告诉他时，也就意味着她将英达认定为了家人一般的可信任的人。在这里，漂泊的少女在流浪中以“白桦”的身份过着无根的虚假的生活，而在她内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支撑着她的归属和精神依托，也就是自己能够真正作为“李典礼”而生活的故乡。

但是在小说的末尾，偶遇的老人却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郑氏心心念念的故乡“森浦”，如今却已经被填为陆地，成为了一个工地。原来的村子、渡船、小岛，一切熟悉的东西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的而又同质化的工地和建筑。一瞬间，郑氏失去了他心灵的港湾，意味着他的故乡已经不再存在，那个原来心中的归宿彻底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无根性和流浪，“不经意间，他跟英达的处境完全一样了”（《客地》，2010，23）。虽然小说没有交代白桦的后续，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少女在到达目的地后，或许也会发现自己故乡和归属的消失，进而“李典礼”从此也死去了，少女只能以一个非本真的异己的“白桦”这个身份来生存。

而英达的处境，或许才是广大离乡的群众最终的归宿和结果，就是纯粹的异乡人和无根。郑氏和白桦（也许），最终都成为了英达一样的人，而小说之外，则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和

^① [韩国]黄皙暎：《客地——黄皙暎中短篇小说选》，苑英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北京第1版，第4页。

流浪者最终都成为了英达。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英达在这个寻根主题的故事里却始终没有寻找自己的家，或许他早已经接受了故乡的缺位，因而对于稳定和归属不再怀有渴求。英达这个人物也暗示了“归乡”的不可能性，因而必须接受这样一种归属的缺位，承受失乡之苦。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暗示着，在离乡的那一刻，失乡就已不可避免，而这些底层人民所拥有的，也就只剩下那个异己的身份和异己的生活。

除了《去森浦的路》以外，黄哲暎其他中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也都拥有类似的境遇和失乡之苦。在《身边的人》中，卖血为生并一步步走向堕落深渊的杀人犯“我”在故乡的家庭并不能给他归属和安定，负担家口的哥哥没有混上自留地，只能依靠租地勉强维生，而自己不愿意埋没在无希望的农村里，希望到城市白手起家打拼一番。可以说，主人公“我”自始至终就没有一个可以念想的归属与故乡。而《发财猪梦》开篇为我们展现的就是一个城市边缘的棚户区衰落和令人窒息的景象，垃圾堆、臭水沟、密密麻麻的简易棚子为我们展现出城市化过程中没有进入资格的乡民在外围的生存状况。不同的是，这些棚户区不是底层失乡民暂时的借居之所，而是他们唯一的生存空间，是整个家庭的妻儿老小生活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生存状况正类似失去“李典礼”而只能以“白桦”生存的少女。《大力士之梦想》里，主人公已经失去父母，故乡的家已然不存在，因而只有去城市“找个活干才能活下去”（《客地》，2010，84）。在末尾，他开始怀念农村的阳光和大地，“哗哗地流着眼泪开始离开这个城市”（《客地》，2010，96），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猜想，他离开城市后，等待着的是否也是郑氏所遇到的无家可归的遭遇。

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不仅摧毁了底层民众的乡土和精神家园，同时也使得整个的时代精神趋向一种虚无主义的惆怅和落寞。在《大力士之梦想》中，购买主人公肉体服务的有钱女人的话提醒我们这种根植于现代性的生存论危机：“世上怎们就这么悲凉。人活着怎们就这么没意思。和你带劲地睡一觉，再怎么睡也觉得怎们就这么悲凉呢。不管是去国外旅游，还是收集首饰、玩钱，那口子事业也挺发达，可为什么就总流泪呢？”（《客地》，2010，95）。现代社会使得物质成为唯一的追求，在生产物质财富积累的时候也生产着赤贫阶级和笼罩在社会各个阶层上的价值缺失。意义——这个人类独有的，尊严所在的，幸福基于其上的东西，如今却和“森浦”与一切故乡一样被驱散了。

二、异化与边缘化——肉体出卖与人之失格

如果说，失乡和归属感的丧失更多是一种精神的惆怅和落寞，那么底层民众在城市里遭遇的苦难和他们的生存本身却是一种血淋淋的物质现实。黄哲暎并不仅仅局限于揭示精神家

园的丧失,更致力于揭露产业化过程中底层被剥削被异化的命运,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之失格。因此,黄哲暎的小说的核心所在并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追忆和对于“田园牧歌”——乡土的简单浪漫化倾向,相反,他的小说处处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记叙着底层人民的血泪与抗争,体现出强烈的民众意识和社会关怀。

迅速的产业化过程使得涌入城市的底层民众成为了资本主义最廉价的燃料,甚至连“被剥削”本身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奢望,因为他们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技能和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产业化造就的是“赤贫阶级”,而不是一般地能够依靠劳动而生存的“无产阶级”。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赤贫阶级对于生存的需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赤贫阶级的不需要——使得这部分底层民众进一步边缘化。那么唯一可能的生存手段就只剩下一个选项,那就是纯粹的肉体出卖。

肉体出卖是黄哲暎中短篇小说里隐藏的一个不变的主题。这些主人公的身份各异——《去森浦的路》中的纯力工、妓女;《身边的人》中的卖血者;《发财猪梦》中的工程事故受伤者和招妓者;《大力士之梦想》中的色情演员与男妓;《客地》中被困于工地的力工——但都进行着纯粹的肉体出卖活动。这种肉体出卖也代表着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身体”意义的重构。也就是说,“农业社会中的劳动力仅仅包含‘劳动’的意义,随着产业化社会的到来,这一意义内涵扩展到‘交换’和‘货币’等经济意义”^①。

在《身边的人》中,有着退伍军人身份的杀人犯“我”曾经进城打拼,却一开始就被人偷了钱,从此一无所有,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我”挑过担子,爬过台阶,要过饭,最终在基东的建议下走上了卖血这条不归路。作家细腻地描写了主人公卖血的经历和心理变化,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赤贫者在卖血的道路上走向毁灭的历程。“卖血”这种肉体出卖活动来钱快,不费劲,文中主人公的同伴基东一针见血地点明了卖血的实质:“卖血跟嫖娼没什么两样。越穷越想干,干完了又后悔。干体力的尝上卖血的滋味后就算该干的都干了。不想再小小气气地过日子了……”(《客地》,2010,30)。随着卖血的越来越频繁,“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但是挥霍和卖血的诱惑就像毒品一样吸引着“我”再来一次。

而《大力士之梦》则叙述了一个乡里人怀着当摔跤选手的理想进入城市闯荡的历程。身无分文的“大力士”一峰只能辗转于各种底层杂活,最后在一个澡堂里干为别人搓澡的活。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一位“导演”选中做了“电影演员”,但结果是,这个所谓的“电影”实际上却是色情电影,而他与搭档“爱子”从事的无非是色情片的制作。从本质上来讲,这种色

^① 高思雨:《黄哲暎小说中都市底层人物形象研究——以1970年代中短篇小说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16年,第39页。

情电影的制作无非就是一种公然的卖淫行为，贩卖自己的肉体以满足观看者的性欲，换取不菲的报酬。在逃离色情电影行业后，一峰又被迫从事男妓的工作，甚至做到一天之内隔几个小时就去一次。而频繁的卖淫工作给他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和身体损伤，并最终导致了他的阳痿和崩溃。

这种将肉体作为纯然交换货币的现象也出现在《发财猪梦》中，在那里，身体意义的转变更是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工厂工作的青年根浩在意外事故中失去了三根手指，意味着后续劳动能力的丧失，但是他却不以此难过，甚至有些幸运，因为三根手指换来了工厂的三万元医疗费赔偿。而其母亲的反应则更为讽刺“老天爷啊，真实谢谢你了。这个节骨眼上三万块钱啊！这到底是什么都不用犯愁啊，我说呢，怎们什么事都这么顺当呢。太好了，太好了呀”（《客地》，2010，75）。本来应当令人难过惋惜的大事故在底层挣扎着的人来看却成了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本来应当为了身体和人服务的财富与金钱如今却成为了主体，反而身体和生命成为了客体，成为了交换的商品和获取财富的手段。

用肉体的造血功能来换取金钱，用肉体的性功能来换取报酬，用肉体的损毁和丧失来换取赔偿，这些冰冷的物质交换以生命本身作为代价，换取同质化的无生命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人已经沦为了牲畜，因为人和牲畜一样仅仅剩下了肉体的剥削价值。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异化劳动”的概念，这个词语指的是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下工人的生存处境：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着异己的力量，生产着支配自己的力量；工人通过劳动生产得越多，他自己就越不自由，因为他的劳动的成果并不属于他；与此同时，异化劳动使得人与其类本质即社会性的劳动的本质被异化，劳动在这里仅仅成为了维持生命的手段而不是生命本身的发展。而130年后的韩国产业化社会，这种“异化劳动”甚至更进一步，显示为纯粹的肉体出卖与剥削。如果说“异化劳动”还保留着劳动者“劳动”的本质（身体在这里至少是为了劳动的，是创造着商品的），也就是其相对的能动性的话，那么这种单纯出卖肉体的劳动，就是身体本身的商品化，也是纯然的人类尊严的丧失——纯粹和完全的被支配——人被贬斥为牲畜。

当人的通过劳动谋制自己的生活并改造世界的本质权利被剥夺后，他就纯粹成为受动的，边缘化的，被排除出了“人”的社会。因而正如小说中故事的走向所示，肉体贩卖必然最终导向人类“生命”和“尊严”这两个最宝贵和重要的人之为人的条件的丧失，因而最终导向人之失格和毁灭。

《大力士之梦》的主人公一峰则在爱人爱子的离开后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被支配感：“自己是没有力量摆脱那感觉大的无边的澡堂的”（《客地》，2010，91）。在作为男妓工作

后，一峰积累起来不小的财富，但是自己对于女人却产生了极大的厌腻——当性成为工作时，自己成为她们性欲的发泄对象，而她们也不再是能够带给自己自然感情的活人，而是成为了单纯工作的任务。性的能力和关系在这里被异化为单纯的商品服务关系，而在一峰这里，被异化的既是自己，也是那些与自己性交的对象，更是自己的性功能和爱欲的能力。但是性和爱欲本来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人的天然的欲望和情感的一部分，当它们被异化为异己的商品和活动时，这种功能也就迎来了其终结——“先是失去了心情，如今身子也失掉了”（《客地》，2010，96）。在知道爱子永远不会回来之后，一峰那个一直以来支撑着自己的本真的位面——作为爱子的丈夫的一峰，也就随着消失了“我感觉到爱子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客地》，2010，96），而自己如今只是一个“被阉割”的可悲的“非人”——“我知道我是被阉割的人了，我也明白了我曾经是个奴隶。我只不过时几块肉而已。”（《客地》，2010，96）

频繁的不断止的出卖肉体使得原本还对城市抱有一丝希望的青年们逐渐失去指望，他们一步步变为行尸走肉，走向“死亡”的深渊——沉沦与堕落。而《身边的人》中“我”的遭遇甚至比一峰还要悲惨，卖血使得“我”不仅在价值上被定义为牲畜一样的商品资源，自己的人性和尊严也在这种异化中被扭曲。而这过程不可摆脱地伴随着“我”的卖血经历。第一次卖血的我心里并不很情愿，对于卖血也怀有恐惧——“好像我生命的全部一滴一滴地渗出去一样。反正觉得有些委屈”（《客地》，2010，30）。而第一次卖血之后“我”还没有完全地丧失希望，而是选择将钱存下来，攒本钱为将来谋划。而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卖血就容易得多也频繁得多，在这之后“我”的生活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糕了。恶性贫血和伙伴基东的离开使得“我”内心充满不安，天天为了一顿饭担忧的状态不断地消磨着人的意志。最后一次为“会长”输血后，“我”的身体崩溃了，求生的意志也瓦解了。“我”用卖血换来的钱一次性挥霍干净，喝了个烂醉。一无所有的“我”最终认清了首尔的现实和自己的处境：“和那个把活生生的人当药的老不死的什么会长并排躺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客地》，2010，36），即明白自己非人的处境和没有任何希望的未来。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主人公是如何一步一步失格和走向毁灭的。卖血意味着自己生命的出卖和丧失，因而“我”一开始还有所顾忌，因为自己起码还对自己的生命有所坚持和尊重，希望用生命换取生命的再生产——对于未来的谋划和积蓄。而当“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和卖血的实质后，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命已经被整个社会贬斥为了可利用的纯粹肉体资源时，也即自己实则已经沉沦为牲畜时，“我”自己对于自己生命的坚守也就瓦解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类尊严的失格的人，转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挥霍与纯粹的感官追求，并在挥霍之后的情绪爆发中杀死别人——同时杀死早已死亡的腐烂的自己。

小说的主人公们出卖肉体换取到了的是什么？不是物质和财富，不是身体的再生产，不是可希望的未来和可生存的境遇；相反而是精神和肉体双重——生命——的毁灭。一群无希望的人，在这种境遇里，所需求的不是遥远不可及的幸福快乐，而是苦难的摆脱，对于现实的逃避。活着本身不仅没有意义，而本身仅仅是求生和离苦的意志，最原始的低级欲望的满足（酗酒、嫖娼）和神经递质的释放成为了唯一生存能够继续的驱力。然而这种驱力不外乎意味着生命在异化和剥夺中无可奈何走向毁灭，走向非生命和反人类。

《身边的人》中“我”的独白用饱满的感情抒发了对于这种人之失格的无奈和悲痛：“啊，我也是个人啊。可是，我怎么就穿着这破烂的军服呢？我为什么在寒风里冻得直发抖还穿不上件内衣，为什么饿肚子，为什么连血都卖呢……想来想去，我发现好像不止我一个人，整个城市都充斥着一些非人的东西。”（《客地》，2010，31）

三、坚守与反抗——最后的希望

面对非人的命运，和整个社会的畸形与异化，人们究竟能够指望做什么？对于这一点，黄哲浬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一条出路，因为他并没有能力给出一条出路，遍历了现实性的物质暴力之后，作家或许没有信心也不愿意坐而论道，他深知自己的无力，而那些脱离现实而大谈出路和规划的空想对现实无益。

在黄哲浬 80 年代的作品《峡谷》中，作家向我们提出了没有答案的问题。在给一位妇女的回信里，他对于这一切苦难如是回答：“这片土地上没怎么上过学拼命干活最后自己焚身而亡的年轻人，碰上飞来横祸在水泥路上挣扎着头破血流身亡的年轻人，我住过的那个城市里许多的年轻人，两眼闪光的年轻人，他们都无辜地死了。这片土地的死亡和苦难的主人正是我们。”（《客地》，2010，148）在苦难中死去的人已经逝去，而“我们”这些并不在如此苦难中的人，还能过上体面生活的“中产阶级”，则“应该在现在这种并不乐观的生活之上，更加努力地改善振在休战线徘徊之前的所有社会关系。”（《客地》，2010，149）然而作家也知道这些话不过是劝解人生的、理所当然的话。在后来与犯了反共法的金一起喝酒时遇到进过四次监狱的流浪汉子以后，作家最终迎来了情感的爆发：“好，我们知道自己是这种万般难受的苦难的主人。可那苦难的真正主人是谁？是谁？”（《客地》，2010，157）面对现实苦难的无力感令作家奔溃，但是，在末尾作家同时决定像古代的故事一样，朝着黑暗中的一点光明走进又黑又长的峡谷。

然而在尊严丧失之后，在“无生命，反人类”的对立面，是否还有一点希望呢？我们或许可以从那些小说中所描绘的苦难的命运间隙里看到这样一星半点的希望，也就是《峡谷》

中提到的黑暗中闪着的灯光。

《大力士之梦》中的色情片演员一峰和爱子也曾有过片刻的爱情和温暖，而这是一峰唯一感受到一点人性和安定的时光。一峰将与爱子决定一起逃出来而不再从事色情演员的那一夜称为“贵重而又自豪的夜晚”（《客地》，2010，90），因为这一夜一峰和爱子不再是作为贩卖肉体和爱欲的“非人”，相反，这一夜他们是作为人而自己拥有自己的身体和爱情，这种自豪感仅仅是成为“人”而获得人的尊严的自豪感。在这种人的感情中，他们至少片刻争取并获得了生命与人性——“因为我们相信，失去的肉体能够从对方的肉体中重新争回来。”（《客地》，2010，90）不仅在《大力士之梦》中，特属于人的温情也在《去森浦的路》中也有所体现。英达、郑氏、白桦这三个流浪者在同行中互相帮扶，提供温暖，并且白桦夜对于英达产生了爱恋，在分别时说自己永远不会忘了英达和郑氏并告诉了英达自己的真名。这些片段都带给读者苦难中一丝温暖的感觉，体现着人性的高光。

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底层的失格之人甚至哪怕连一丝温暖都没有，苦难里他们没有任何聊以慰藉的东西，这时候的希望就是一种无指望的希望，一种不得不依靠牺牲和自我毁灭换来的人性最后尊严的坚守。

在《客地》中被欺凌被剥削的劳工们选择通过反抗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然而在单位和警察的威逼利诱下，他们的运动和罢工最终没能坚持下去。眼看着运动就要失败之际，青年民工东赫决定点燃自己含着的炸药包用生命的毁灭捍卫自己的抗争，这时“他相信自己的决定没有白费，他自己都为自己坦荡无顾的心境吃惊。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希望之感似乎要充满他全身。”（《客地》，2010，257）他在最后的牺牲里获得了希望感，一种用死亡而把希望托付于未来的敞开感，并用勇气坚守了他作为人最后的尊严。而《身边的人》中最终在卖血中一步步走入堕落深渊的“我”则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方式，这种方式甚至没有任何崇高感，没有温情，没有慰藉——杀人——这种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正确的行为带给“我”的直到最后都是罪孽。最后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自甘堕落”的罪恶滔天的杀人犯咎由自取，得到应有的制裁。然而文中的“我”受尽了世界的恶意，只有刀子本身才能让我确证一丝残存的属于人的力量和安心感，在杀人时，“我”觉得“就像在别的国家的战场上我挥动的枪口那样”（《客地》，2010，40），在杀人后，又感到“我真是憋死了，我们自己人之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这样呢？”这种非人的窒息感最终使得“我”无目的地用刀捅人，同时也意味着自己被捕和被判死刑。因而杀人是一种终结，那把意味着终结的刀子在指向自己之前恰好插进了一个碰巧撞在自己情感爆发那一点的陌生人体里。在杀死那个陌生人之时，“我”也同时杀死了一个已经成为“非人”的行尸走肉的自己，杀死了整个非生命反人性的东西在“我”身上留

下的一切。

可以看到黄皙暎小说里的人物最后都以一种无指望无意义的方式追逐着人的尊严。最后的希望——通过对于人的和生命的最后尊严的追求与坚守所达成。然而这种坚守却往往不得不以放弃生命为代价，以生命的毁灭和绝对的堕落为代价。这种悲剧性的现实里折射的是 60-70 年代韩国的整个时代和民族的悲哀与无奈。

结 论

我们通过正文三个部分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了黄皙暎早期中短篇小说的主题和主旨，并揭示了小说下所展现的产业化时代底层民众和整个民族之伤痛。在第一部分，我们探究了黄皙暎小说的前提和第一个主题，即产业化时代发生的普遍失乡，精神家园和归属感的丧失使得人无家可归，因而不得不接受自己无根的身份，并不可避免地接受在城市中被异化和边缘化的命运。由此我们过渡到第二部分，这种异化和边缘化的命运在城市中集中体现在一个主题上，即肉体出卖。我们结合文本揭示了肉体出卖的表现和“身体”被异化为交换商品的现实改变，并进一步指出，肉体出卖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人的“非人”化、牲畜化，即意味着人的尊严的完全丧失和生命的“死亡”——人之失格。而面对这种失格和异化，对于如何面对这种异化与失格的回答将我们引向第三部分。在最后一部分里我们揭示了黄皙暎对于残酷现实的热切关怀和现实的无力感，并分析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间隙残存的一丝希望。这种希望偶尔是暂时的温存和真挚的感情，但是更多的是用生命的毁灭换来的无希望的反抗与苦难和异化的物理终结。

通过全文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黄皙暎小说的民众性和现实主义特色，能够加深对于上世纪 60-80 年代韩国民众文学的理解和感受，并进一步从小说这个切入点出发去理解韩国现代化的历史，体会威权时代韩国产业化带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失衡的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剥削给底层民众和整个民族带来的肉体与精神的伤痛。最后要指出的是，黄皙暎始终以大众的社会参与作为文学的永恒主题，并将对于非生命、反人性的东西的批判和对于其反面——人性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坚守，作为文学家和文学贯穿始终的责任。通过全文的分析和探讨，我们能够看出并理解这一点。即黄皙暎通过小说饱含感情地揭示出非人性反人类的东西在底层民众的经历中留下的痕迹，传递出悲哀与无奈，以此带来批判与反思，指向其反面并由此触及未来之行动。

参考文献

1. 《当代韩国史》，曹中屏、张珽瑰等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 高思雨：《黄皙暎小说中都市底层人物形象研究——以 1970 年代中短篇小说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16 年。
3. [韩国]黄皙暎：《客地——黄皙暎中短篇小说选》，苑英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4. 《韩国文学简史》，金英今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 月第 1 版。
5. [韩国]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1 月第 1 版。
6. 金光熙：《大韩民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7. 焦艳：《黄皙暎的传奇经历和文学创作》，外国文学动态，2004 年第 5 期。
8. 金正日：《黄皙暎社会问题小说的变化样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 年。
9. 聂宝梅：《〈去森浦的路〉象征意义探析》，文学作品评论，2011 年 7 月刊。
10. 朴娜拉：《中韩“乡下人进城”文学比较——以罗伟章、黄皙暎作品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7 年。
11. 宋砚轩：《黄皙暎小说中的社会底层“归属”意义》，文化学刊，2018 年 3 月第 3 期。
12. 吴太镐：《贯穿于时代的现实主义者画像——论黄皙暎》，当代韩国 2006 年夏季号。